

五代吴越国墓葬制度研究

郑以墨

(河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18)

内容提要:目前发掘的五代吴越国墓葬多为吴越王室及大臣墓,其墓制演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大致可分早、中、晚三期,这种变化与吴越由盛转衰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吴越国墓葬的装饰与形制部分沿袭唐代,但也体现了吴越国独有的墓制特点和明显的地域特色,特别是中晚期墓葬中的十二生肖、气象图等图像,不仅是吴越陵墓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具有辟邪祈福的深刻含义。

关键词:吴越国 墓葬形制 装饰图像 陵墓制度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成为晚唐最突出的时代特征^[1]。各藩镇的节度使权力很大,“集民政、戎事、刑狱于一身,将佐僚属皆自行奏辟,生杀亦自己出,权任之重,与唐略等”^[2]。随着藩镇之间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激烈争夺以及藩镇内部的形势变化,各藩镇势力不断地此消彼长,甚至相互兼并,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政治上的分裂必然会带来文化发展的地域差异,此时各个政权的墓葬也分别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

本文将选择吴越墓葬进行分期研究,以期揭示其墓葬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原因。此种选择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其一,吴越政权自唐乾宁三年(896年)钱镠据有两浙地区至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俶归顺宋朝,历时82年,是南方十国中割据时间最长的一个^[3],在此期间,该政权先后经历了五代国王,包括钱镠、钱元瓘、钱弘佐、钱弘俶、钱俶。目前发掘的吴越国墓葬共13座,大多分布在浙江杭州、临安、乐清和江苏苏州地区,包括1958年发掘的杭州M26吴汉月墓、1962年发掘的临安M20钱元玩墓、1965年发掘的杭州M27钱元瓘墓^[4]、1970年发掘的临安板桥M21五代墓^[5]、1978年发掘的临安M23晚唐钱宽墓^[6]、1979年发掘的苏州七子山一号墓^[7]、杭州三台山M32五代墓^[8]、1980年发掘的临

安M24钱镠母亲水邱氏墓^[9]、1986年发掘的浙江乐清县五代墓^[10]、1996~1997年发掘的临安M25康陵^[11]、文化大革命期间清理的临安M22吴越墓^[12]。其中除乐清县五代墓外,其他均为吴越王室及大臣墓,它们分属吴越政权的不同时期,其规模、形制及装饰形式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与规律性。

其二,与吴越国墓葬相比,其他政权的墓葬材料较为薄弱。其中已发掘的中原政权的高规格墓葬有王处直墓、李茂贞夫妇墓、冯晖墓、内蒙古清水河县山跳岭墓地和洛阳伊川孙璠墓等,但分布较为零散,发展规律并不明显,尚无法进行系统的墓葬制度研究。前、后蜀的墓葬除王建墓、孟知祥墓外多为大臣墓,且由于两个政权存在的时间均较短,因此其墓葬规模及形制的规律性、制度性亦不十分明确。南唐的重要墓葬有李昇陵、李璟陵,其他均为小型平民墓葬,并无分期之必要。南汉的德陵、康陵和昭陵在形制虽有明显的变化,但由于这些墓葬保存状况较差,目前还无法进行深入研究。而闽国等其他政权的墓葬更是零散,只能期待新的材料的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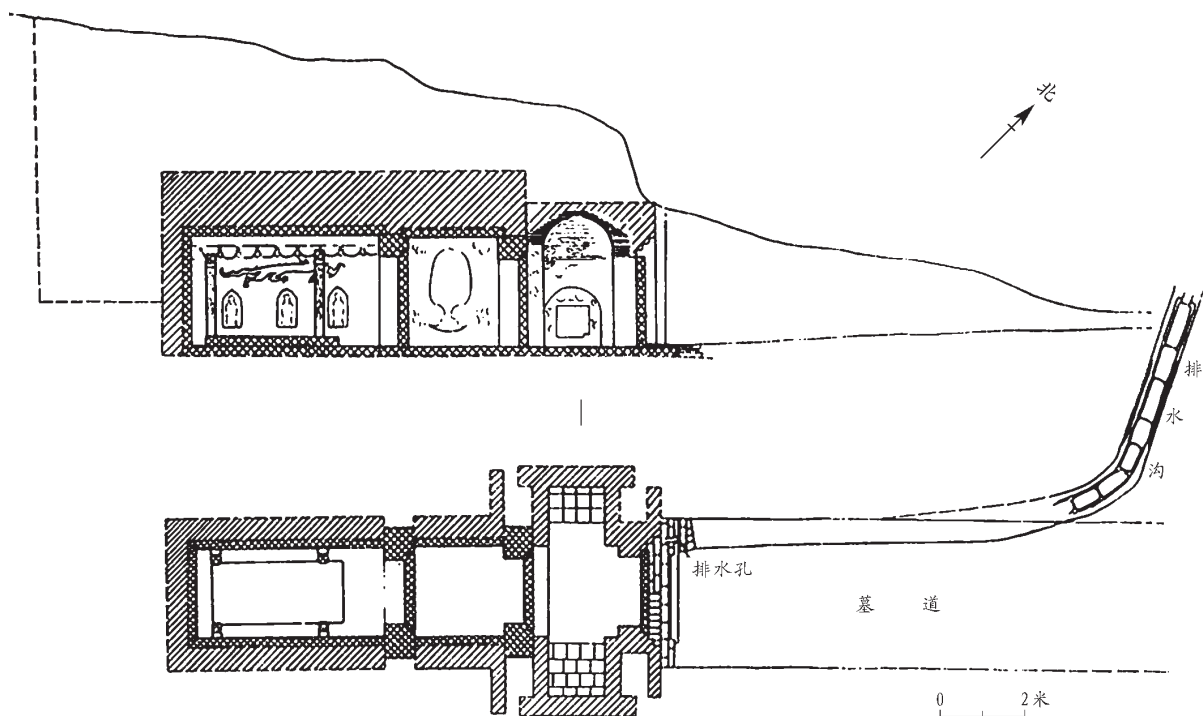
根据墓葬的形制及装饰内容可将吴越国墓葬分为五型^[13]。

A型 三室壁画墓,前室两侧各有一耳室。墓室有彩绘,后室均装饰有四神和十二生肖人物浮

收稿日期 2009-07-31

作者简介 郑以墨(1972~),女,河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讲师、中央美术学院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美术考古。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河北科技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的资助,课题名称:《五代墓葬美术中的设计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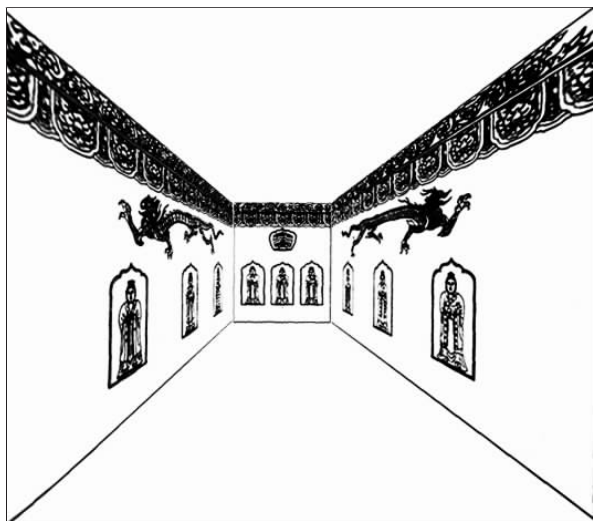


图一// 康陵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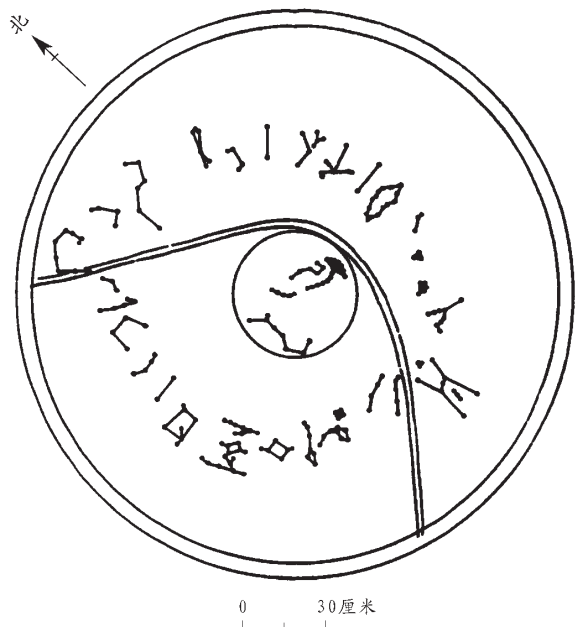
雕,顶部装饰有石刻天象图。此种类型的墓葬有杭州M27钱元瓘墓、临安M25。

临安M25康陵(后晋天福四年,939年) 全长26.1、宽11.7米。包括墓道、前、中、后室,前室两侧各有一耳室(图一)。前室呈方形,为砖砌穹窿顶结构,左右各有一耳室。前室内壁原有彩色图案,但受损严重,仅左侧及后端转角上方残留三组斗拱,后侧门券上也绘有朱红色缠枝牡丹花。两耳室三壁各绘一株红色牡丹,高约1.08、宽0.83米。中室平面呈正方形,上下左右均以红色砂石岩构筑。中室左右两壁均绘有彩色图案,每壁两上角绘红绿色云气纹,两下角绘红色火焰形图案。两壁中部绘盛开的牡丹,左壁的牡丹高1.73、宽1.1米,其上有花26朵;右壁牡丹高1.8、宽1.1米,其上有花28朵。花瓣均为红色,花蕊用菱形金箔点缀,并以绿叶托衬。枝干近根部贴饰十余枚圆形金箔,根以红绿云气纹组成。后室平面呈长方形,上下及四壁均为红色砂石板构筑。后室石门正反两面均光洁平整,正对中室的一面绘成两扇红色木门,上部浅刻栅栏,着以绿色。整扇门面装饰六角形金箔门钉92颗,并用金箔贴成圆形铺首门环。左右壁及后壁上部雕刻并彩绘上下两层宽带状牡丹图案,宽约50厘米。后室三壁及门背面中部浅浮雕四神及十二生肖人

物像(图二)。顶部石板正中刻有一幅星象图,内容为紫薇垣和二十八宿,上有贴金装饰(图三)。棺床位于后室正中,以整块红色砂岩制成,四侧面分别刻有三组壶门形图案,并涂以朱红色。棺床前后两端立有上窄下宽的石枋。额枋呈拱形,两端呈圆形卷云状。额枋两面用金箔贴两只展翅飞翔的凤凰,并以绿白两色绘出云彩。该墓墓主为钱元瓘皇后



图二// 康陵后室左壁、右壁、后壁彩绘雕刻



图三// 康陵后室顶部天象图摹本

马氏^[14]。

杭州M27钱元瓘墓（后晋天福六年，941年）土坑石槨墓，分前、中、后三室，前室两侧带砖砌耳室。前室原施彩绘，但因淤土漫漶，内容不清。后室各壁有石刻雕刻，石刻可分为三部分：四壁上沿雕刻宽带状牡丹花图案，每组图案由一大一小的牡丹花纹组成，上面着有颜色。大花心金色，花瓣红色，叶石绿色；小花花瓣红色，叶金色。四壁中部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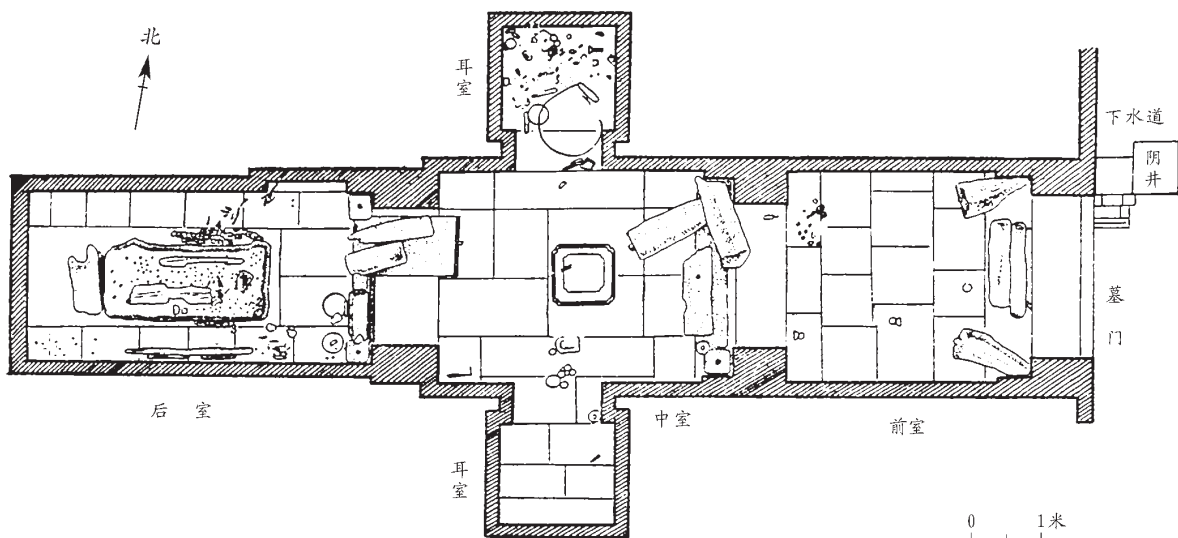
四神浮雕。四壁下部为十二生肖神像，自北壁正中的“子”开始，顺时针排列。东壁为寅、卯、辰，南壁为巳、午、未，西壁为申、酉、戌，北壁为亥、子、丑。每像各居一龕，双手拱在胸前，十二生肖抱于怀中。后室顶部发现石刻天象图，刻于盖顶阴面正中，原顶板为一红色砂页岩。星象图上有贴金装饰，内容为紫薇垣和二十八宿。石槨为红色砂砾岩，石槨外加筑拱顶砖室。

B型 无壁画和浮雕装饰的三室墓，中室两侧各有一耳室。此类墓葬只有苏州七子山一号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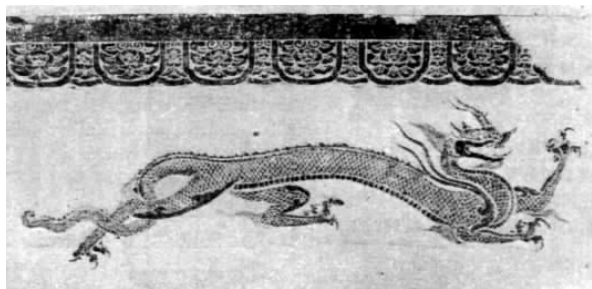
苏州七子山一号墓 墓室全长14.34米，分前、中、后三室，中室两侧各附有一耳室（图四）。整个墓室均为券顶。前室平面呈长方形，中室平面作长方形，左右两各一耳室。后室规模较大，平面长方形，中间靠后壁处，置一青石棺床，现长2.65、宽1.13米。

C型 平面呈长方形的双室壁画墓，后室装饰有四神和十二生肖人物浮雕。此种类型的墓葬有杭州M26吴汉月墓、临安M20钱元玩墓。

杭州M26吴汉月墓（后周广顺二年，952年）土坑石槨墓，分前、后两室，其结构同钱元玩墓。前室原施彩绘，但因淤土漫漶，内容不清。后室装饰同钱元瓘墓，各壁均有石刻雕刻，石刻可分为三部分：四壁上沿雕刻宽带状牡丹花图案，每组图案由一大一小的牡丹花纹组成，上面着有颜色。大花心金色，花瓣红色，叶石绿色；小花花瓣红色，叶金色。四壁中部为四神浮雕（图五：1、2）。四壁下部为十二生肖神像，排列方式同钱元瓘墓。后室盖顶阴



图四// 苏州七子山一号墓平面图



1



2

图五//

- 1.吴汉月墓四神之青龙雕刻拓本
- 2.吴汉月墓四神之白虎雕刻拓本

面中间偏后为石刻天象图,中心小圆直径42.6厘米,外缘次第刻三个同心圆,最大直径为180厘米,内容为紫薇垣和二十八宿。石椁为红色砂砾岩。墓主吴汉月为吴越国王钱元瓘的次妃、钱俶的生母。

临安M20钱元玩墓 土坑石椁墓,分前、后两室,结构与吴汉月墓相同(图六)。墓葬彩绘及浮雕装饰与吴汉月墓完全相同。据《临安县志》,墓主钱元玩为钱镠第十九子,生前于净土寺修禅,法号普光大师。圆寂后,即葬,墓前建塔墓,号普光塔,有墓主人的石雕遗像。

D型 后室平面呈船形、多耳室的双室墓,此类墓葬包括浙江临安晚唐M23钱宽墓、临安M24水邱氏墓、临安板桥M21五代墓、临安M22吴越墓、杭州三台山M32五代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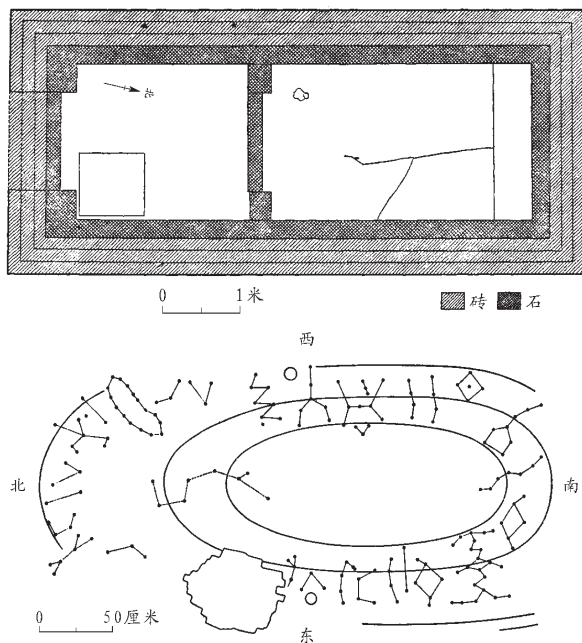
临安晚唐M23钱宽墓(唐光化三年,900年)墓室系长方形多耳室券拱顶砖室墓,与临安M21、M22基本相同。全长6.78米。分前、后两个墓室,墓室之间有短过道。前室略呈方形,穹顶,东西两壁各有一耳室。后室略呈船形,两壁向尾部收弧。顶盖略呈半椭圆状。东西两壁分别有大小不同的耳室和壁龛各两个。后壁有大小不等的壁龛3个。后室设棺床。前后墓室原均施彩绘。前室两壁耳室之

上绘叶绿心红的花各一盆,花形似牡丹,用勾线填涂法绘制。穹顶有彩绘图案,绘半径不等的圆三重,中心小圆内绘金色圆点28个,衬以绿底;其外绘八角形,每只角外绘花叶组成的“文”字样。后室两壁的耳室和壁龛周围都施红绿相间的宽带状彩绘,局部已漫漶脱落。顶部绘天文图一幅,内容为二十八宿和北斗,其上有群星上有贴金装饰,其间用土红色线条连接(图七)。墓主钱宽为五代吴越国王钱镠之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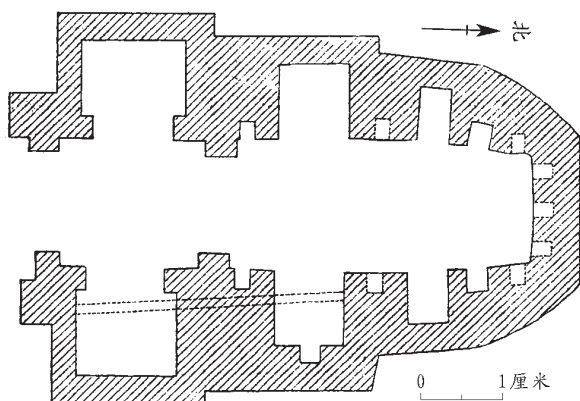
临安M24水邱氏墓(唐天复元年,901年)该墓在临M23即钱宽墓的东侧,两墓相距仅6米,且埋于同一封土中。此墓保存完整,为券顶砖室墓,与钱宽墓基本相同。后室顶部的石灰层表面绘有星象图一幅。根据出土的墓志,墓主人是钱宽的夫人水邱氏。

浙江临安板桥M21五代墓 系多耳室竖穴券顶砖室墓,分为前、后两室,全长6.16、高1.57~1.94米(图八)。前室南端有短甬道。前室呈长方形,穹隆顶,东西两壁各有一耳室。前室原有彩绘。前后室之间有过道。后室略呈船形,拱券顶,东西两壁分别有2个大小不等的耳室、壶门和壁龛各两个。后室的棺槨为木制。报告推测墓主人为“吴随□”,可能是吴越前两代吴姓王妃的亲属。

临安M22吴越墓 土坑砖室墓。墓葬分为前、后两室。前室之前有甬道。前室大体呈方形,穹隆



图七// 钱宽墓顶部天象图



图八// 浙江临安板桥五代墓平面图

顶,左右壁各有1个耳室。前后两室间有过道。后室两壁斜向内收,平面近船形,拱顶,左右两壁各有2个大小不等的耳室。后室中部设棺床,有方形腰坑。报告推测墓主人应为吴越国某一大臣或钱氏家族成员。

杭州三台山M32五代墓 墓室全长4.95米,包括甬道、前室、过道、后室四部分。前室平面呈长方形,穹隆顶。南北两壁各有一耳室。后室平面呈船形,券顶,墓顶似覆船形。墓壁设有安装木门的小孔、耳室、壁龛和壶门。后室中部设棺床,高5厘米。棺床下有小坑。报告推测,墓主人可能是吴越国某一大臣或钱氏家族成员。

E型 竖穴土坑墓,此类墓葬有乐清县五代墓。

乐清县五代墓 共3座,分别为M1、M2、M3,平面均呈长方形。其中M1长2.2、宽0.9米;M2长2.4、宽1米;M3长2.8、宽1米。均属平民墓葬,未有明确纪年,且无相关墓葬进行比较,无法确定其分期,因此暂不予讨论。

总体看来,吴越墓葬大致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为吴越早期,从唐乾宁三年(896年)钱镠据有两浙地区至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吴越国的建立。这时期的墓葬为C型,其中钱宽墓及其夫人水邱氏墓有明确纪年,据此可判定,无明确纪年的其他C型墓当属于吴越早期。这些墓葬的后室呈船形,带有很强的地方特色。

钱宽及其夫人水邱氏墓室中均有彩绘,此做法应承自唐代壁画墓的传统。此外,钱宽墓前室两壁耳室之上绘有花卉1盆,这种盆花的形式不见于唐、五代壁画墓,而是较多出现在较晚的辽代墓葬中,如宣化辽M10张匡正墓(大安九年,1093年)后

室北壁门楼两侧绘有2个蓝色大花瓶,缸内为盛开的大朵牡丹。M1张世卿墓(天庆六年,1116年)前、后室四壁上方均绘制有瓶花^[15]。可见,该墓中的盆花应属五代花鸟画的新样式。

第二期为吴越中期,同光元年(923年)钱镠建立吴越国至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钱弘佐卒。这时期的墓葬为A型和B型。其中苏州七子山一号墓无明确纪年,其墓葬的形制规模与A型相似,年代应与之相近。墓主可能是当时的贵族,其墓葬规模明显小于钱元瓘墓与康陵。钱元瓘墓和康陵的形制及图像的配置均与前期不同,体现了吴越国较为完备的陵墓制度。

从墓葬形制上看,两墓均为三室,前室两侧各有一耳室。这是对前期形制的改造,即在原有的规模上增加一室,将后室的船形改为长方形,并摒弃后室的耳室。三室的形制与前蜀王建墓、南唐二陵相似,至于该形制的来源,似可看作对唐代帝陵制度的延续。唐代帝陵的地宫多未发掘,唯一发掘的唐僖宗靖陵(888年)结构较为简陋,由阶梯墓道、拱顶甬道和横拱顶土洞墓室组成,全长44.7米^[16]。靖陵建于唐代行将灭亡之际,规模上还不如盛唐的大臣墓,尚不能代表唐代的陵寝制度。但目前已发掘的懿德太子墓^[17]、永泰公主墓^[18]均“号墓为陵”,墓室为前、后两室,由此推测,唐代帝陵应是高于此规格的三室结构。

从墓葬装饰来看,墓室均装饰有壁画、浮雕,其中后室的图像组合呈现一种固定的模式:四壁上沿雕刻宽带状牡丹花图案,中部刻有四神浮雕,下层为十二生肖人物像,室顶的石板正中刻星象图,内容为紫薇垣和二十八宿,其上有贴金装饰。十二生肖、青龙、白虎、天象图的组合见于唐代冉仁才夫妇墓,所不同的是,该墓中的青龙白虎绘于甬道东西两壁,十二生肖位于墓室东、西两壁的12个壁龛中^[19]。相比之下,钱元瓘墓与康陵等墓中的星象图、四神及十二生肖的位置关系极为固定严整,可将此看作规制化的结果。

第三期为吴越晚期,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钱弘佐弟钱弘倬继位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国灭亡。这一时期的墓葬包括B型吴汉月墓和临安M20钱元玩墓。两座墓葬后室的图像布局延续了钱元瓘墓和康陵的做法,但墓室的规模缩小为两室。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吴越王室墓葬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对此,笔者试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寻找线索。钱镠虽于唐乾宁三年(896年)据有两浙

地区,但直至同光元年(923年),才被中原政权册封为吴越国王,其“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谓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统内曰制敕,将吏皆称臣,惟不改元,表疏称吴越国而不言军”^[20]。随着吴越国的建立,各项礼仪制度也逐渐完备,陵墓制度也必然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钱宽及其夫人水邱氏墓分别建于900年和901年,时间在建国之前,因此未能按照吴越国的陵墓制度来建造,而是更多地体现出当时的地方特色。

吴越中期,王室政权较为稳定。钱镠具有建国之功,在臣民中的威望自不待言。后唐长兴三年(932年),钱镠卒,钱元瓘作为钱镠指定的继承人顺利登上王位。他“善抚将士,好儒学,善为诗,使其国相沈崧置择能院,选吴中文士录用之”^[21],因此在位期间也受到众大臣的拥戴。天福六年(941年)七月,钱元瓘卒,其子钱弘佐继位,年仅13岁。由于当时钱元瓘的余威尚在,因此新主虽幼,却受到众大臣的支持和保护,政局较为稳定^[22]。上述政治背景无疑为吴越国陵墓制度的完善与实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此外,《五代史》载:钱元瓘“性尤奢僭,好治宫室”^[23],其个人喜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王室墓葬的面貌。这一阶段的钱元瓘墓和康陵的墓葬形制统一,壁画或浮雕布局严谨,是吴越国陵墓制度的典型代表。

钱弘倧是继钱弘佐之后的又一代吴越国王,他继位不久便被废。此后被拥立的钱俶亦无实权,吴越王室自此衰落^[24]。这一时期的吴汉月墓和钱元玩墓后室保留了中期的图像配置方式,但整体规模明显缩小,由原来的三室变为两室,这种变化正是当时政治背景使然。

值得注意的是,吴汉月墓和钱元玩墓的形制并不尽相同,后者只有前后两室而无耳室。原因可能有二:一,两人身份的差别。钱元玩虽为皇室成员,但身份等级应低于后妃。二,钱元玩拥有皇室成员和普光大师两重身份,其墓葬的建造可看作是佛教与世俗的一种融合:一方面,按照佛教的安葬方式在墓前建塔;另一方面,地宫又参照了吴越陵墓的模式。

在讨论了吴越墓葬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原因之后,还有必要对其中重要的图像进行解释。首先是中、晚期墓葬后室的十二生肖、四神及天象图的组合,它们作为墓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含义。

十二生肖在墓葬中的主要功能是标识方位、辟邪禳福^[25]。中、晚唐时期,十二生肖俑在墓中盛

行,并成为当时法定的官员独享之明器,庶民无权使用。《唐会要》对此有明确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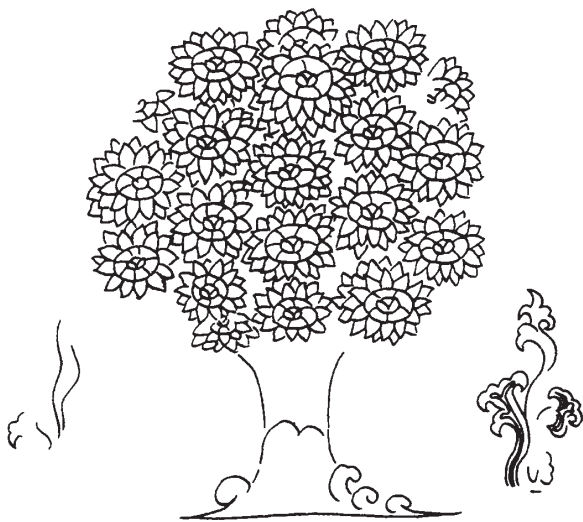
(元和)六年十二月,条流文武官及庶人丧葬:三品以上,明器九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五品以上,明器六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九品以上,明器四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庶人明器十五事……挽歌、铎、簠、四神、十二时各仪。^[26]

在墓室中开小龛放置十二生肖的做法常见于唐代关中及中原的一些没有壁画的墓葬^[27],吴越墓葬中的十二生肖显然继承了这一传统做法。五代其他政权的一些墓葬中也设有十二生肖,如王处直墓(924年)^[28]、闽国刘华墓(930年)^[29]、南唐李昇墓(943年)^[30]等,但这些墓葬中的十二生肖均单独出现或与天象图组合,并无固定的搭配模式。

四神在中国有着相当长的发展历程,根据李星明的研究,四神在唐代已具有多重含义:1、代表天文学中四个赤道宫和东、西、南、北四方;2、表示四时的循环往复;3、阴阳五行的表征;4、作为周天四宫之象是神圣品格和特权的象征;5、死者升居天国的引导者和护卫者,具有驱邪镇鬼、厌除不祥的功能;6、用以比拟理想的风水环境^[31]。吴越墓葬中的四神应兼具上述几种功能。

钱元瓘墓、康陵、吴汉月墓的石刻星象图基本一致,它们加工细致,星象的位置相对准确。根据伊世同的研究,钱元瓘墓中的星象图应是在北纬37°的位置观测的结果,且根据天枢星出现的时间及其与天球北极星的位置关系,结合当时的天文观测活动,推测该星象图之原图的观测年代大致在开元年间^[32]。图上有贴金装饰的做法应意在模仿群星闪耀的景象。钱宽墓和水邱氏墓中绘有星象图,与钱元瓘墓中的天象图有着共同的来源——一幅唐代早期的天文图或摹本^[33],但它的外形呈椭圆形,是传统天文图中的几个特定纬度圈在椭圆墓室中的变形,原来盖天图中几个同心圆的天文坐标关系,已被装饰意味所代替^[34],与写实的星象图明显不同。此外,同时期其他政权的墓葬中也多有星象图,如王处直墓前室顶部、李昇陵后室顶部均有彩绘星象图,但准确度均不高。相比之下,钱元瓘墓、康陵、吴汉月墓的石刻星象图可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天文图。天文图作为缩微的宇宙具有标识时空的作用,此外,古人创立天文图的目的还在于寻找宇宙万物的和谐,如《新唐书》记载:

原古人所以步圭影之意,将以节宣和



图九// 康陵前室之左耳室牡丹壁画摹本

气,辅相物宜,不在于辰次之周径。其所以重历数之意,将欲恭授人时,钦若乾象,不在于浑盖之是非。^[35]

吴越墓葬中极为写实的天象图更是以一种精密的方式演绎着乾坤宇宙的运行,以实现“节宣和气,辅相物宜”。再结合十二生肖与四神的特殊含义,可知,三者的组合构成了基本宇宙时空的模型,是古代“盖天说”的延续,代表着宇宙的时序。而被天象图、十二生肖、四神所环绕的墓主正好位于宇宙的中心,象征着他尊贵的地位。同时,十二生肖与四神均具有厌胜辟邪之功能,意在保护墓主在死后世界的安全。

此外,康陵中室及耳室壁面均绘大株牡丹,钱元瓘墓、吴汉月墓、钱元玩墓前室原有彩绘,但已漫漶不清,但根据康陵的壁画内容,推测这三座墓可能也会有牡丹图。康陵的牡丹图与河北曲阳王处直墓前室的花鸟画在构图上基本一致,但造型更为夸张,极具装饰性,且一株牡丹占据整个壁面的做法尚属首例(图九)。画家将单棵花株塑造成高耸挺拔的花树,叶片重重叠叠,花头数量大大增加,硕大的花头遍布花树,并注意花头的朝向,大有繁花似锦之势。根据文献记载,花朵繁多的牡丹备受时人推崇。

慈恩浴堂院有花两丛,每开及五六百朵,繁艳芬馥,近少伦比……僧乃自开一房,其间施設幡像,有板壁遮以旧幕。幕下启关而入,至一院,有小堂两间,颇甚华洁,轩庑栏槛皆是柏材。有殷红牡丹一窠,娉姿几及

千朵,初旭才照,露华半晞,浓姿半开,炫耀心目。朝士惊赏留恋,及暮而去。^[36]

更有意思的是,花朵的多少还与花卉的价格有关^[37],如白居易诗中所云:“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38]可见,康陵中的大株牡丹,应是一种财富的象征。此外,牡丹有富贵之气,康陵中的牡丹花蕊用菱形金箔点缀,枝干近根部贴饰十余枚圆形金箔,更增加了其华贵的效果。根据罗世平的研究,牡丹还隐藏着一层特殊的含义,即传达“子孙富贵,家族荣昌”的祈福目的^[39]。可见,此时墓葬中绘制的牡丹不仅用于装点墓室,更是财富和富贵的象征,同时还可作为子孙祈福。

综上所述,吴越国的墓葬制度继承了唐代的某些传统,但在墓葬形制、布局及装饰形式上又体现出明显的独特性,其发展变化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吴越国发展的缩影。与同时期其他政权墓葬相比,吴越墓葬材料更加丰富,并呈现出一定的发展规律,为我们研究吴越乃至五代的墓葬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1][2]朱玉龙编著:《五代十国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97年,第1页。

[3]吴越国在今浙江省及苏南境内,后又扩展到福州。

[4][12]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考古》1975年第3期。

[5]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临安板桥的五代墓葬》,《文物》1975年第8期。

[6]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市文管会:《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字款白瓷》,《文物》1979年第12期。

[7]苏州市文管会、吴县文管会:《苏州七子山五代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2期。

[8]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杭州三台山五代墓》,《考古》1984年第11期。

[9]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考古组:《杭州郊区施家山古墓发掘报告》,《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61年第1期;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94~104页。

[10]王同军:《浙江乐清县发现五代土坑墓》,《考古》1992年第8期。

[11]杭州市考古所、临安文物馆:《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康陵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2期。

[13]张玉兰将这些墓葬分为两期。张玉兰:《晚唐五代钱氏家族墓葬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05年第5期。

[14]“秋七月,遣左仆射何瑱致祭于吴越国王。冬十二月辛巳,皇后马氏殂。”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五十八,《四库全

- 书·史部·载记类》卷一五九,第238页。可知,马氏为吴越皇后。
- [1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38页。
- [16]陈安利:《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125~130页。
- [17]陕西省博物馆、干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 [18]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
- [19][27][31]李思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124、194、124页。
- [2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二,中华书局1979年,第8880页。
- [21][23][24]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吴越世家第七》卷六十七,中华书局1974年,第841、841、842~843页。
- [22]孙先文:《吴越钱氏政权研究》,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
- [25]Judy ChungwaHo,形码 The Twelve Calendrical Animal in Tang Tombs, in *Ancient Mortuary Traditions of China: Papers on Chinese Ceramics Funerary Sculptures*, ed. by George Kuwayam,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91, pp62~83.
- [26]《唐会要》卷三十八“葬”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13~814页。
- [2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五代王处直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1~32页。
- [29]福建省博物馆:《五代闽国刘华墓发掘报告》,《文物》1975年第1期。
- [30]南京博物馆:《南唐二陵》,文物出版社1957年。
- [32]伊世同还发现,杭州的地理纬度为30°,那么该星象图所依据的原图并非在杭州所测。但当时在北纬37°这一线上并未设立重要的观测点,而北纬34°~35°的开封、洛阳、西安一带却是重要的观测地点,这一矛盾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伊世同:《最古的石刻星图——杭州吴越墓石刻星图评介》,《考古》1975年第3期。
- [33]伊世同:《临安晚唐钱宽墓天文图简析》,《文物》1979年第12期。
- [34]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市文管会:《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字款白瓷》,《文物》1979年第12期。
- [35]《新唐书》卷三十一《天文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805页。
- [36]唐·康骕:《剧谈录》卷下“慈恩寺牡丹”条,《文津阁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卷三四七,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63页。
- [37]刘婕:《唐代花鸟画研究——考古学与绘画史》,中央美术学院博士论文,2008年。
- [38]唐·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买花》,《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五,中华书局1960年,第4676页。
- [39]罗世平:《观王公淑墓壁画〈牡丹芦雁图〉小记》,《文物》1996年第8期。

On the Tomb System of Wuyue Kingdom in the Five Dynasties

ZHENG Yi-mo

(Art School,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18)

Abstract: So far, most of the excavated Wuyue Kingdom tombs were the royal families' and the officials'. The evolution of the tombs' shape,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wa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uyue Kingdom. Though some factors of the decoration and shape inherited from the Tang Dynasty, the other reflected the particular feature of the tombs & mausoleums and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of Wuyue Kingdom, especially the 12 Zodiac patterns and the celestial maps in tombs of the middle and late stages not only made up the important elements of the Wuyue tombs and mausoleums, but also contained profound meaning of avoiding evil and praying for good luck.

Key words: Wuyue Kingdom; tomb shape; decoration pattern; mausoleum system